

东南亚大企业家

鲁思·麦克维伊 编著

薛学了 译



厦门大学出版社

[闽]新登字 09 号

本译著已获美国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授权出版

东南亚大企业家

鲁思·麦克维伊 编著

薛学了 译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三明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9.5 印张 210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5615-1185-x/F·196

定价:12.00 元

译 著 序

鉴于本书的主编鲁思·麦克维伊教授所著的第一篇论文《东南亚企业家的崛起》基本上是对全书的综述和理论归纳,译者自量才疏学浅,不敢在此班门弄斧、妄加置评,以免曲解作者的原意。

译者翻译本书的目的,只是想把本书各位作者对东南亚各国(地区)的企业巨子及其企业和企业集团(包括原住民企业、华人企业和外国在当地开办的独资或合资企业)的起源、发展、现状和前景的精彩论述以及书中丰富翔实的有关资料介绍给对此感兴趣的有关部门、研究人员和广大读者,以期能有所助益。

译者还觉得,书中所论及的企业、政府和国家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企业领导人同政治权贵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引起了“寻求租金行为”并由此导致腐败现象等问题,是很值得探讨和引以为戒的。需要说明的是,译著中所反映的是原著作者的观点,译者只是如实地译出,希望读者用分析批判的眼光来阅读和参考。

由于时间仓促和译者水平有限,译著中难免仍有错漏和不尽如人意之处,恳请各位前辈、专家学者和

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斧正。

本译著得到了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黄猷先生和厦大南洋研究所的关怀和大力支持；福建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为本译著的出版提供了慷慨的资助；译著中的一些译名得到了林伍珣副教授、蔡仁龙副教授、黄丁兰助理研究员和沈红芳副教授的鼎力帮助；厦门大学出版社编辑陈丽贞为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译者还十分感谢原著的出版者美国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和主编鲁思·麦克维伊教授授予本译著的翻译出版权，使其得以正式出版。

译者

1996年6月

目 录

东南亚企业家的崛起·····	鲁思·麦克维伊(1)
战后泰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商业银行家、 工业巨头和农产企业集团 ·····	末广 昭(49)
印度尼西亚的工业化及其资本家的经济 与政治发展 ·····	理查德·鲁宾逊(82)
印度尼西亚石油服务业的企业家 和保护政策·····	琼·阿顿(122)
马来西亚企业集团的变化·····	谢丽梅玲(142)
马来西亚的华人企业巨头·····	王伯群(179)
马科斯、其密友和菲律宾经济 发展的失败·····	加里·霍斯(205)
东南亚华人大企业模式的变化·····	杰米·麦基(229)
东南亚的政治和本地资本的增长: 菲律宾和泰国的汽车工业·····	理查德·多纳(262)

东南亚企业家的崛起

鲁思·麦克维伊

资本主义的幽灵正在东南亚出现。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幽灵，它显形于吉隆坡高耸入云的办公大厦、泰国商业中心区金碧辉煌的银行大楼、以及印度尼西亚名流巨子雪白的摩尔人式豪宅。他们的财富既非得自地产，亦非来自官僚职位。然而，这似乎还不能构成“真实”东南亚的一个部分。除了城市国家新加坡以外，人们长期以来一直把该地区想象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区，把在水稻田里辛勤劳作的农民看成是它的象征，而把种植园当作其现代经济部门的唯一真正代表。在那个世界里，商人的地位并不像官员或地主那么重要；积累财富的手段是政治庇护，而不是企业家才能。现在星罗棋布于东南亚地平线上的摩天大厦和厂房不能看作是本地的标志，而应看作是外国人的成就。而且那些参与这些企业的本地巨头，不是外国人的食客就是他们的代理人。由此看来，新的工业只不过是华而不实的海市蜃楼——一位评论家把它称为“伪资本主义”。果真如此吗？还是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看法？

本书的各篇论文论及东南亚企业集团的起源和作用，因

而有助于对上述问题的探讨^①。这些论文都很重视该地区的国内大企业,这主要是由于这些企业是在 70—80 年代建立起来的,而这两个年代正是东南亚转向资本主义的关键时期。

这个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制造业的发展,这并不是由于它已成为一个主要的部门(在任何东南亚国家都尚未如此),而仅仅是由于它的存在。这已不符合“农民东南亚”的旧形象,而且引起了人们的推测:该地区是否已开始进行工业革命了。实际上,一些分析家把充满活力的(即具有国际竞争能力)制造业基础的建立,看成是衡量任何真正资本主义特性的标准。在这里,我们衡量的标准并非很严格,我们只是把资本主义理解为这样的一种制度:掌握在私人手中的生产手段被用来创造利润,其中一部分利润又用来进行再投资,以便提高盈利能力。因此,我们也论及农业综合企业、银行与其它服务业、建筑业、贸易、采矿业以及其它非制造业领域,如果它们是以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并含有国内资本的话。

要确定它们是否符合这些标准并非总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往往很难认清在哪些地方外国企业结束其控制,而国内企业则开始进行控制。而且,要分清“寻求租金行为”——即不进行生产性投资,而是利用诸如土地等资源或政府授予的专利权来抽取利润——和严格意义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一件简

① 本书的论文来自 1986 年 12 月在泰国素可泰举行的讨论会,该讨论会由美国社会学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会理事会有关东南亚问题联合委员会主办。除了主办机构的支持以外,泰国的社会科学协会还慷慨地提供了后勤帮助。当然,上述机构都不对这里所表达的观点负责。

单的事情。^① 这些问题对于评价东南亚企业扩展的意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们也是导致人们对东南亚资本主义的“真实性”产生许多不同意见的根源。^②

一般说来，涉及经济转变的研究充满了各种抽象概念——如资本、劳动、世界体系、发展战略、强硬国家和软弱国家——这些研究的麻烦程度决定了研究的结果。在这些“巨人”的面前，单靠人的努力就犹如蚍蜉撼树；我们也许忘了它们充满了各种抽象概念。此外，我们将发现，很多有关东南亚资本

① 马克斯·韦伯采用“政治资本主义”这个词来指那种使得官职和政治关系可以用来谋求利润的制度；他把这看成是前现代化经济的一个共同特征。因此，他似乎并不像当前的许多分析家那样，把资本主义和掌权者的“寻求租金行为”之间的区别看得那么绝对。

在区分真正的资本主义行为和前、准、伪、或纯粹非资本主义行为方面的困难，可以通过以下事实来加以说明：在诸如农业综合企业等某些领域，多国公司可能以相当不同的方式来组织其活动，以便迎合当地的统治集团和文化；有时它们直接地同当地生产者建立资本主义关系，而有时则通过庇护系统来从事活动。当然，我们会毫不迟疑地给大公司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并把明显违反常规的行为看成是对当地环境的适应；但是，当我们谈到性质不明确的个人或企业时，我们的心中就无数得多了。

② 有关官僚寻求租金行为的资本主义性质（这种情况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最为典型），我们将在下面详细讨论。在菲律宾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鉴于其国内的种植园主往往将其营业利润用来获得更多土地，而不是用来改善其生产手段（要不然，他们的行为就该无可争议地称为资本主义行为了），是否应该把他们归类为真正的资本家呢？结果，有些分析家就把汉斯·鲍贝克的“租金资本主义”（相对于充分现代化的农业综合企业的“生产性资本主义”而言）理论应用于菲律宾的种植园农业。见艾尔弗雷德 W·麦科伊和埃德·C·德杰塞斯编著的《菲律宾的社会史：全球性贸易和本地的转变》（奎松：Ateneo de 马尼拉大学出版社，1982 年），特别是见麦科伊和布赖恩·费根的论文。

主义的性质与前景的推论,都取决于东南亚企业领导人的社会来源和文化倾向,以及企业领导人同政治权贵之间关系的性质——这是一些有关行为者的问题,而不是有关他们所做的事情。通过考察企业领导人和企政关系的变化模式,我们可望描绘出更广泛的东南亚社会及其国家演变的轮廓。由此可见,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工具来探讨我们的论题(但必须特别强调东南亚企业家的特性与作用),似乎是很有裨益的。

我们把研究范围局限在大企业,首先是由于在过去的 20 年期间,东南亚资本主义发展得最引人注目的成分,是大企业而不是中小企业。无论内陆小商人的企业推动力有多大,要不是由于在这个时期那些卓有成就的巨头们建立了政治经济关系,看来是不可能出现巨大变化的。他们导致消除了民族主义和官僚机构至今一直对企业发展所实行的许多限制性条件。他们营造了这样的思想与经济环境:它展示了对巨头们的资本主义努力的广泛同情与支持。那种促进了东南亚近几年经济增长的工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高级官员同外国援助、外国投资与外国市场的提供者之间的最高层协商所作出的安排。小生产者可能供应那些为投资和进入市场(一旦向它们开放)作好准备的大公司,中型企业也可能直接获得它们的供给,但中型企业的机会产生于由国家政府和大企业所打下的基础。最后,我们发现,正是在主要的工业领域,最明显地体现了企业、政治和国家之间的联系。我们还将发现,这种联系对东南亚的资本主义热潮是非常重要的。

理论的设想与修正

迄今,有关东南亚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往往都采用三种主要解释中的一种来作为它们的论点:即儒教文化、市场魔力和强硬国家——吉列恩·哈特把它们简称为 CC、MM 和 SS。^① 所有这三个论题反映了有关经济发展性质和企业家地位的一般争论,“儒教文化”是由对文化在经济行为中作用的更广泛讨论所派生出来的。我们将在后面的东南亚具体情况中讨论它们。但是,我想在这里对它们作一般性的介绍,并概略地指出它们的来源。

“儒教文化”这个论点的经历很奇特,因为它开始时并不像现在那样,用来解释为什么东亚的资本主义发展会那么成功,而是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不可能成为出色的资本家。一个世纪以前,它所涉及的问题是,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和美洲,而不发生在其它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当时的答案显然是白人天赋的优越性,但是一些不满足于这种解释的学者则求助于新的社会科学来寻找原因。于是,马克斯·韦伯便探讨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它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经济的落后归因于儒教反复灌输的价值观。^② 这种解释被借用到有关东南亚的研究上,人们用上述解释来说明(既然迁往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移民的企业家作用不容否定,

① 引自吉列恩·哈特的私人书信。

② 韦伯著的《中国的宗教》,特别是在最后一章,他把儒教价值观和清教徒的价值观进行比较,并把它们同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的商人没有建立公司企业,以及为什么他们似乎竞争不过西方的大企业的问题。

日本战后的资本主义成就最初被解释为,它和欧洲一样具有封建的历史。但是,当不仅是韩国,而且台湾,然后是香港和新加坡加入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行列,而中国本身也显示了其企业家的活力时,似乎就有必要进行更一般性的解释了。其原因似乎已不再那么明显地在于同欧洲结构或经历的相似性。而且,有些分析家还发现,在这些国家(地区)里存在着共同的中华传统文化因素,在勤劳、秩序、个人责任心等方面的价值观促进了资本主义行为。当然,他们的眼光避开了经济成就不佳的越南,而越南则声称它比日本更有资格获得儒教文化的遗产。^①

这种推理方法在东南亚引起了强烈的政治反响,因为它意味着经济实力雄厚的华族对土著居民具有文化优势,而实际上人们早已普遍这么认为了。^② 除了在华人占大多数的新加坡以外,这种理论使东南亚的政治领导人不得不这样认为,

① 见 G·L·希克斯和 S·G·雷丁,《工业化的东亚和后儒教的假说:对经济学的挑战》(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3 年)。有关华人文化在东南亚所起的作用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是否把华人的企业战略看成主要是文化的或历史的产物:试将希克斯与雷丁的论文“菲律宾的文化和公司业绩:华人之谜”[载于《纪念哈里 T·大岛的发展经济学论文集》(马尼拉:菲律宾发展研究所,1982 年),第 119—215 页]同维克托·辛保·利姆林甘(Victor Simpao Limlingan)的《东盟地区的华侨:企业战略和管理惯例》(马尼拉:维塔发展公司,1986 年)进行对比。

② 例如,见马哈蒂尔·宾·穆罕默德,《马来人的困境》(新加坡:唐纳德·穆尔,1970 年)。

那种旨在摆脱西方霸权的斗争，已引来了在文化和经济上都占有优势的另一个少数民族。实际上，原先的理论一直把他们和华人置于同等的地位，并且告诉他们必须要么牺牲其文化认同，要么牺牲其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取得成就的雄心。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某些东南亚国家已作出巨大的努力，试图削弱该国华人的优势，以便免于陷入困境。

基于“市场魔力”的解释起源于资本主义本身，它认为竞争能使工作效率高和有创新精神者从人（或企业）群中脱颖而出，并使报酬得到合理的分配。当然，情况并不总是以我们所熟知的方式发生，但由于旨在纠正不平衡和不公正（通常是由国家干预所造成）的努力经常导致了经济停滞或政治腐败，因此强调政府管制经济的时期和主张回到资本主义基本原则的时期往往是交替出现的。在 80 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强调供应学派经济学方面的雄辩才能以及共产主义体系的瓦解，导致出现了一种信仰市场魔力的热潮。

不言而喻，依赖市场魔力一直是援助国与援助机构，特别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忠告。对市场魔力的依赖使它们的投资获得较大的保障，特别是使它们得以进入有关的经济领域。因此，它们所提供的成功秘诀往往强调了开放经济、限制国家的作用、寻求比较利益、努力工作、以及通过限制国内消费和劳动报酬来恢复正常的价格。

然而对新独立的国家来说，这条道路似乎充满风险：一个国家怎样才能竞争得过比它强大得多、有经验得多并且已经确立了地位的势力呢？对此的可能回答是，一个人如果注定要被打败，那么他倒不如捉弄一下对手。我们将发现，这就是新加坡的回答。然而，对于一个已确立的贸易市场来说能行得通

的事,对于一个具有广大农业腹地而且尚未具备资本主义环境的国家来说,就未必是一种可行的选择。正如依附论者所确信的那样,看来它们注定要处于受支配的地位。

普遍的折衷方案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这在 50 年代东南亚的独立国家特别突出。该战略的含意是,在国内经济中创造一个得以建立工业和培养企业家才能的空间。在这个场所建立的企业可以向该国提供那些要不然就得进口的一般制成品,从而节省了宝贵的外汇。当然,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国家的大力干预,但在该经济成熟时,这种干预就不大必要了。

泰国最初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实施这个战略,即把它作为一种措施来抢救萧条的国家资本主义所遗留下来的工业残余,而这又是由披汶·颂堪在 30—40 年代建立自给自足经济的努力所造成的。印度尼西亚的战略表现为 50 年代的“堡垒”计划,它不仅保护国内资本家避免同外国竞争,而且还排挤了非土著的(即当地华人)商人。从工业发展的观点来看,这是个十足的失败,因为它是政客及其朋友们(新兴企业家)染指的政治大分肥。正如霍斯的论文所表明的那样,菲律宾的战略也导致了腐败,但也许是由于它在企业与行政方面的经验丰富得多,以及由于涉及华人的作用这一有争论的问题较不严重,该战略也带来了企业活动的繁盛时期。然而,到了 60 年代末,它就面临着拉丁美洲所经历过的工业深化危机。

在其早期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似乎较易于实施,因为那时人们仅凭较少的投资和技术就能够生产简单的制成品来满足国内需求。然而,国内需求的制成品很有限,而且贫穷国家的国内市场很快就饱和了。要向高级产品扩展(更不用说民族主义制度所钟爱的基本工业了),就意味着需要从国外进

口更多的物资和技术；结果，其成本就会远远超过国内生产所必需的外汇储蓄。缺乏经验和旨在避免同进口产品竞争的保护政策都意味着国内制造商无能，它们的产品也没有竞争力；它们不仅将其高昂的生产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且还转嫁给那些不得不采用国产零部件的国内厂商。因此，该战略削弱了而不是增强了国内厂商的国际竞争能力，而且它的昂贵代价反而导致了国内市场规模的缩小。菲律宾的经历充分表明，其结果是经济萧条、政治骚乱和民众不安宁。

特别是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 60 年代中期以来施加的压力下，摆脱危机的办法就是面向出口工业化。就这一方面而言，发展中国家（地区）应该着重生产那些它们能比发达工业经济更有效地生产的制成品（主要是由于它们的劳动成本较低，而且由于它们对环境污染的限制较少以及购买其产品的国家关税壁垒较低）。在这种努力过程中，它们应该充分利用同多国公司的关系以及利用外国的资本、技术和国际销售知识，以便克服它们在这些方面原有的弱点。国家（政府）还必须进行严密的监督，以免外国人过分利用其本地合伙人最初的经验不足而占便宜。

其结果将是，制成品带来了而不是消耗了外汇，经验与技术进步将该经济的国际竞争能力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据称，鉴于不仅是美国和日本的企业，而且韩国和台湾的企业也开始将其制造业生产向海外转移，东南亚国家（地区）可以利用这些投资的产品循环来从事于新的日益增值制成品的生产。人们较少谈及的是，这样会使它们依赖于高度专业化和不稳定的国际市场，以及它们的竞争能力很快就会被那些向外国合伙人提供更低劳动成本和更好保护措施的国家所超过。

在过去的 20 年期间,面向出口工业,特别是在电子产品和纺织品方面,一直是东南亚经济成功的标志。不过,它们究竟应该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还是实行面向出口工业,实际上都取决于哪一种战略对有关的工业最可行和最有利。两种战略都需要有国家(政府)的大量投入。在第一种战略中,国家实行公开的管制,而在后一种战略中,国家则起着一种较不明显的,但却同样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在 20 世纪末叶,国家在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方面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对东亚的经济成就来说显得如此的重要,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分析家在“国家”身上看到了工业化的成功要素。

“强硬国家”的论点在 70 年代中期开始变得流行起来,但它的理论背景还可以追溯到 60 年代。当时,西欧和美国发生了国内骚乱,第三世界国家(地区)的民主与民粹主义制度也衰落了。作为对此的反应,一种有关秩序、等级制度和稳定的新观点取代了有关分享民主制的自由主义观点。这种观点(例如塞缪尔·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①)在有关“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的讨论中引起了反响。冈纳·米尔德尔用相对于“软弱国家”的“强硬国家”这个词来表达这种观点。^② 到 70 年代中期,重新注重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导致了一场主张以“使国家重新发挥作用”为中心思想的学术运

①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纽黑文和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1968 年)。

② 冈纳·米尔德尔,《世界贫困的变化》[纽约:潘西奥恩(Pantheon),1970 年]。

动。^① 国家被看成是解答依附论者所提出难题的钥匙,其有关“第三世界国家除非进行革命来摆脱资本主义制度,否则就不可能实行工业化”的论点,由于在拉丁美洲出现所谓“促进发展的独裁主义”政权而受到了挑战。^②

人们一直认为,促进发展的强硬国家的基本要素是:它独立于各部门的社会势力,因而它不仅能够调和分歧和维持秩序,而且能够制定出提高该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地位的

① 有关自主论点的理论阐述,见迪特里希·鲁谢迈耶(Ditrich Rueschemeyer)和彼得B·埃文斯的论文“国家与经济转变”,载于彼得B·埃文斯、迪特里希·鲁谢迈耶和西达·斯科克波尔合编的《使国家重新发挥作用》(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4—77页,以及该书编者的结束论文“朝向对国家的更正确理解”,第347—366页。至于对这种观点的批评意见,见伦纳德·宾德的论文“发展理论的自然历史”,载于《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1986年第28卷第1期,第3—33页,以及斯科特·沃克的论文“超越从属地位的典范”,载于《当代亚洲杂志》,1986年第16卷第1期,第79—95页。

② 有关有助于对拉丁美洲促进发展独裁主义和东南亚的经历进行比较的论述,见戴维·科利尔编的《拉丁美洲的新独裁主义》(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9年),特别是科利尔、费尔南多·亨里克·卡多索和吉勒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等人的论文。一些对此有所助益的论文还有J·和A·瓦伦朱拉(Valenzuela)的论文“现代化和依附论:在拉丁美洲研究中的供选观点”,载于《比较政治》,1978年第10卷,第535—559页;弗明D·艾德里安诺的论文“评官僚独裁主义国家的论点:以菲律宾为例”,载于《当代亚洲杂志》,1984年第14卷,第459—484页;彼得·埃文斯的论文“东亚的阶级、国家和依附性:拉丁美洲事务学者可以借鉴的教训”,载于《亚洲新工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弗雷德里克C·戴约编(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7年);M·K·达塔-乔杜里(Datta-Chaudhuri)的论文“工业化和对外贸易:韩国和菲律宾的发展经历”,载于《出口带动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E·李编(日内瓦:ILO,1981年),第48—77页。

战略。我们将在后面剖析有关这一论点的假设。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该理论符合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论点，后者力图解释为什么资产阶级国家（指拿破仑的法国）能够实施那种违背部门利益的保持稳定政策。^① 该理论还首次把政治经济学引入对亚洲工业化国家（地区）的讨论。在此之前，人们仅用文化和社会或者缺乏政治观点的经济学来进行解释。

随后有大量关于东亚经济奇迹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毫不惊奇地发现，是国家的指导而不是独力的进取支持着它们的成就^②（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实际上没有对这些国家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国家过去和现在都起着重

①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第一次出版，1869年第三版。

② 例如，见斯蒂芬·哈格德和穆恩·仲英(Moon Chung-in)的论文“国际经济中的韩国国家：自由化、依附性还是重商主义”，载于《相互依存关系的自相矛盾》，约翰·杰勒德·拉吉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31—189页；托马斯·戈尔德，《台湾经济奇迹中的“政府”和社会》（纽约州 Armark：M·E·夏普，1986年）；艾丽斯·阿姆斯登，《亚洲的下一个巨人：韩国和延迟的工业化》（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罗伯特·韦德的论文“政府在克服市场失灵方面所起的作用：台湾地区、韩国和日本”，载于《东亚实现工业化》，1988年），第129—163页；罗伯特·韦德的论文“‘外向型’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干预：新古典理论和台湾的实践”，载于《东亚的促进发展的国家（地区）》，戈登·怀特编（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8年），第30—67页；以及理查德·卢德—纽拉思的论文“韩国的国家干预和面向出口经济发展”载于怀特的《促进发展的国家（地区）》，第68—112页。

有关那些就东亚经验对东南亚的适用性提出有用警告的研究，见布鲁斯·卡明斯的论文“东北亚政治经济的起源和发展：工业部门、产品循环和政治影响”，以及斯蒂芬·哈格德和张敦仁(Tun-jen Chang)的论文“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的政府和外国资本”，都载于戴约所编的《亚洲新工业主义的政治经济》。